

当代江苏学人丛书



韩儒林传

朔漠情思——历史学家韩儒林

韩儒林传

● 韩朔眺 陈得芝

出身农家

韩儒林先生，字鸿庵（亦作宏安），1903年11月2日（清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四日）次癸卯，生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黄林村。家世业农，6岁时就学于村塾，时读时辍，有时也跟随父亲在田间耕作。因二伯父无子女，儒林先生少时即嗣与二伯父为子。

1914年（民国三年）秋，先生入本村初等小学，学习国文、算术。1916年秋考入舞阳县立高等小学，于1919年毕业。由于家境困难，学业难以继，先生恳求二伯父允其完成学业，二伯父以

韩朔眺为韩先生长子，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得芝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每学期必须考第一名为条件，先生苦读三年以年年第一的成绩实现了求学愿望。后来先生和子女谈起当年苦学情景，言及家贫无袜，天寒脚裂，疼痛钻心，仅能以面糊涂在脚跟裂缝上用布条缠裹熬过严冬时，常感慨系之。学习期间除应学各科外，尚从师研读《古文笔法百篇》一书 奠定了国学基础。

求 学 汴 沪

1919年夏，先生考入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校三年半，除学习中学一般课程外，主要是学习法文。最早的教师是以后曾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的徐炳昶（旭生）先生。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儒林先生作为当时的爱国热血青年，积极参加了抵制日货的运动，把守城门检查日货，并被选为学生会的代表。1922 年冬学校改为中州大学附属中学，法文班全班转入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 1923 年 1 月先生经汉口至上海学习，时通惠工商学校校长法国人马尔蓬（Maybon）施行奴化教育，先生与同学一起加以抵制并与校长展开斗争。夏初，学生召开大会要求学校改进时，校长召来租界巡捕将全体学生驱逐出校，先生遂搬到复旦大学附近补习功课，准备报考北京大学。

艰 难 大 学

1923 年夏，先生在上海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乙部。当时胡适、梁启超、梁漱溟等名家皆治哲学，徐炳昶先生亦由开封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受他们影响，在预科学习两年后，先生于 1925 年秋升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学习。

1927 年夏，由于战乱，来自河南省的助学官费断绝，先生家

贫，无力负担其学习费用，遂被迫休学返豫。当时石家庄南之京汉铁路不通，乃绕道太原、茅津渡、会兴镇回到开封。前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监学朱骧亭时任商丘省立二中校长，约先生去该校任教，时年 24 岁。未久冯玉祥与张宗昌战于豫东，学校停顿，又回到开封。是年冬，应中州大学之聘，任秘书，负责编辑校刊，代表学校出席开封市各种群众团体会议。后又受聘到河南省立一中任教，一中是由开封十余个中学合并而成，十分庞大，分为高中、初中、男师、女师等校。先生到高中讲授哲学概论及法文，还帮助教务长嵇文甫。建国后曾任郑州大学校长，兼办了半年教务。

至 1929 年夏，先生已休学工作二年，省吃俭用积蓄了 600 多元，遂回到北京大学复学，虽未改系，但受北大著名史学家陈垣、陈寅恪等的影响转治史学，选听他们讲课，并在他们指导下阅读外国东方学家的著作，从西方学者治学方法中扩大了视野，对我国西北舆地之学兴趣日浓，随着钻研日深，他对几十年来国外东方学取得的成就和达到的水平有了进一步了解，深感我国舆地之学已陷入停滞落后的状态，欲求前进，必须要直接利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徐炳昶先生也鼓励先生专攻史学、多读国外著作，对先生治学影响甚大。先生在《穹庐集》自序中说道：“20 年代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有几位师长常常指导我去读一些东方学家的著作，我渐渐从他们的治学方法中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对我国西北舆地之学兴趣越来越浓厚。……遵照师长们的教导，开始从事当日所谓不中不西之学了。”1929 年秋天，经同学介绍，课余还到私立大同中学讲授逻辑学，每周 4 小时，月薪 8 元，以补助学习、生活费用，共教了两个学期。

初出茅庐

1930 年夏，先生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时年 27 岁。大学

毕业后即任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研究所助教，翻译了巴黎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 Seignobos 所著的《文明史》（上卷）翌年出版定名《西洋文明史》。后来又兼任女师大附中教员，讲授中国史及法文。1930年8月与郑味虚女士（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历史系肄业河南罗山人）结婚。

1931年发生日本侵华之九一八事变，华北形势危急，先生于1932年1月离开北平，赴开封担任河南第一高级师范学校教师，讲授历史、地理、逻辑等课程，1933年上半年还同时在前清进士张中孚主办的国学专修馆兼任逻辑课的教学。为求深造，经校长田恩霖介绍，先生以所译之《西洋文明史》向中比庚款委员会申请去比利时留学奖学金，得以获准，但需自筹往返路费。经多方筹措，又得挚友帮助，留学路费方得以解决。8月乘船启程，经法国到比利时。

留 学 欧 洲

1933年9月，入比利时鲁文大学学习中古史及西方史学方法，同时补习拉丁语。鲁文大学为天主教所立，学生中有很多教士，先生与两名教士同学，一名 Vincent de Paul Martin，一名 Sohier 互相教授中文、法文及拉丁文。

在鲁文大学学习一年后，1934年暑假随同学 Martin 教士到圣安德修道院作客，与时任该院神父的前中国政府外长陆徵祥相识，帮其编辑《晋铎纪念册》。其间致函鲁文大学欲转学巴黎习东方学，得到批准，遂于1934年秋转学至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从当时最负盛名的东方学权威伯希和（P. Pelliot）学金帐汗国史和中亚文字，同班同学中有后来的著名史学家邵循正、陆侃如等。同时还在东方语文学学校学习土耳其语，与后任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的于道泉同学。巴黎的生活费用十分昂贵，先生

万般节俭 以菲薄积余购得 1836 年版法译本《旭烈兀传》，1891 年版法译本《札兰丁传》等珍贵书籍。

在巴黎学习了一学期后，为了掌握更多的可用以直接研究蒙古史所需的东方语文，先生于 1935 年春至 1936 年上半年 转学至德国柏林大学东方语文研究所，学习波斯文、蒙文，与柏林大学学生 Schrock 互教中文与德文，晚间到普鲁士科学院学习突厥文，各种东方语言得以渐次掌握。是年强忍长子燕生病卒的悲痛 完成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一文 随后又完成突厥文《苾伽可汗碑译释》及突厥文《墩欲谷碑译文》二篇 三碑皆是研究突厥早期历史之重要史料，此三文为我国最早的汉文译释。后来先生以译释三碑所积累的丰富资料，对突厥祖先传说及官号等展开了研究，推动了我国突厥史研究的进展。

禹 贡 春 秋

1936 年夏先生学成回国，行前赴伦敦游学两周，购得东方学书籍几十册。先生在欧洲写成的对突厥文碑的译释，很得著名学者陈寅恪、顾颉刚先生的赞赏，乃被介绍任燕京大学历史系讲师，讲授西部亚洲史和西北民族史，顾先生并聘先生为禹贡学会研究员。

30 年代前期，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边陲各族人民备受奴役欺凌，不少历史学者和青年学生怀着满腔热血，力求从学术研究中为振兴中华民族尽些力量，在此情势之下，遂形成研究边陲民族史、历史地理、民族演进史和地方史的社会风气。1933 年，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谭其骧先生当时也在辅仁大学讲授中国历史地理，吸引了一批有志于历史地理与民族史研究的大学生奋起追随。1934 年 2 月，顾先生集合北大、燕大、辅仁三校选课学生在寓所组建

禹贡学会 并于 3 月创办《禹贡》半月刊。禹贡之名源于《尚书·禹贡》，这是我们民族发祥以来最古老的地理书，其内容罗列九州、山川、土壤、物产、交通、民族诸方面 颇与现在意义上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相合。我们祖先在古代交通极为闭塞的条件下，能有如此广博严整的知识，实在令后代中国人引以自豪。学会以禹贡命名，寄托着在危难情势下，“华夏不可侮，国土不可裂”的意义，借以表达探源导流、时时以国土民族为念的深愿。一二年后，《禹贡》杂志渐渐引起学术界及社会注意 销行日广 会员人数也从最初的数十人发展到数百人，一批史学新辈团结在《禹贡》周围，渐渐成熟起来，当代史学界的不少老前辈都是那时禹贡学会的参加者。解放后活跃于史学园地中的许多知名学者，如冯家升、吴晗、童书业、齐思和、谭其骧、白寿彝、史念海、朱士嘉、周一良、侯仁之、张维华、杨向奎以及儒林先生等都是当时学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真可谓胜友如云，人才济济。这样一大批人才，荟聚在一起，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堪称盛事。会员们宣称：“我们希望在真实的学识里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大道来”，使得荒塞的边疆日益受本国人的认识和开发，杜绝野心国的覬覦，我们要把我们祖先努力开发的土地算一总帐，合法地承受这份我们国民应当享有的遗产，永不忘记在邻邦暴力压迫或欺骗分化下被夺的是自己的家业”，“使国内各种族领会得大家可合不可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团结为一个最坚强的民族”。这种爱国精神，鼓励了整整一代学人为救国而从事研究。

1937 年初先生接家眷到北平团聚，住小红罗厂禹贡学会新址 与顾颉刚先生及诸同仁朝夕相见 过从甚密 彼此切磋学问 为先生从事西北史地之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先生关于突厥史的多篇论文均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是时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率部抗战 大败日军 收复百灵庙、大庙等重地 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春假期间，北平高校师生应傅将军之邀，由禹贡学会顾颉刚

先生组织访问绥北，燕大师生去的较多，其中儒林先生率领一队约十余名燕大、清华、北大的学生走大青山北路一线（归绥—呼和浩特）—武川—乌蓝花—大庙—达尔罕旗—王府—百灵庙—武川—归绥（呼和浩特）往返十余日，进行实地考察。归来后，先生作《绥北的几个地名》一文，发表于《禹贡》杂志。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顾颉刚先生转赴内地，禹贡学会结束。由于夫人怀孕即将临盆，难以长途旅行，先生只得暂留北平。1938年夏经英国人辅仁大学教授施格利（Zacharias）介绍，离开燕大到辅仁大学任历史系讲师，讲授西北民族史。然困居愁城，国内消息断绝，幸辅仁订有《路透社》，先生常随辅仁教授陈垣、张星烺、徐待峰等老先生聚会一堂，听读新闻。每日清晨，先生必早起快步行走，锻炼身体，为他日长途跋涉，回归抗日大后方做准备。

辗转西南

儒林先生是一位爱国、正直的学者，他不愿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生活。1939年初，次子已1岁多，可以远行了，即冒着危险辗转条件艰苦的后方昆明去。当时华北已被日寇侵占，但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美、英等国与日还有邦交，为安全计，先生请美国所办之辅仁大学开具一个回里省亲的证明文件，先将书籍行李交外国运输公司运走。6月偕妻儿带简单行李由北平前门车站乘火车到塘沽，一路上虽经日寇伪警多次盘查，总算都化险为夷，登上英轮，经上海、汕头、香港到越南海防市，再经滇越铁路到昆明。这一段经历，在韩夫人88岁时所述回忆录中说道：“在北平上火车时，伪警来检查，看到中国票子就拿走。到了塘沽要上船，日本人、汉奸来检查，有些人被带走就再没回来。我们的护照放在一个小箱子的夹层里，他们要检查这箱子，我们

心中很紧张 怕被查出来 这时眺儿骑在箱子上 嘴里还唱着 他们就算了。到了汕头，日本人又上来，没有检查到什么就走了。在越南海防登岸和从老街入境都费尽周折，一言难尽。”

到昆明后，先生初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助理，旋即改任副研究员，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元史，特别是对波斯文拉施德《史集·部族志》用力尤勤 著有《成吉思汗十三翼考》、《雪尼惕与合卜秃儿合思的译名》等文。时昆明物价昂贵，生活不易，经顾颉刚先生介绍 先生于 1940 年 2 月应华西大学之聘赴成都任历史系教授。

时华西大学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闻宥任所长，先生和吕叔湘专任研究工作。从 1940 年春至 1943 年春 3 年中 除在华西大学大学部讲授蒙古史课程外，主要从事元史和西北民族史研究，论著进入旺盛时期，发表了《吐蕃之王族及宦族》等论文 20 余篇 大多刊于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上。1940 年 12 月应齐鲁大学研究所之请，为该所研究生作《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的学术报告，提出著名的我国元史研究五阶段论，认为元史研究的第五阶段应是：“今后研究元史 于域外史料 决不能仍以贩卖西方译文、拾人牙慧为满足。必须直接阅读史料所在之原文，与中文材料作比较之研究。原文不易了解之处，将见中文材料往往可以解释之，中文材料不可解释之处，将见域外材料往往可以订正之。如是研究，始可扫荡洪钧以来元史著述上无数谬误，而渐趋于光明之境域。”顾颉刚又约先生等发起成立中国边疆学会 顾任理事长 先生被推为监事 会刊为《中国边疆》。先生由于刻苦从事研究工作而又生活艰辛，长期营养不良，导致 1942 年冬肺结核病发作，烧饭劈柴时咯血不止，幸而邻居多为华西大学医学院医生，得他们关心指导，在家卧床休息 3 月，病体渐愈。为支撑家用，夫人进入华大人类学实验室从事测量人头骨的工作，后又经吕叔湘夫人的介绍去制革学校担任教导主

任并讲授国文课，一家人艰难度日。

1943年初先生病愈，经顾颉刚先生推荐接替顾去重庆巴县乡下赵家湾村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此会专为少数民族编译书籍，从事翻译者都是蒙、维、藏等少数民族人士，担任编辑者为汉族大学教授或大学毕业生，先生除主持各人译书编辑外，主要从事个人研究，完成《唐努都波》等论文5篇。

在成都时，中央大学即有意邀请先生任教，只为搬家费用需自筹，故难以成行。而边译会提供旅费，故得以到达重庆，先生一直有意重回教学岗位，经多方努力，在先生主持边译会工作1年半后，终得以辞去职务，于1944年8月应中央大学之聘，任历史系教授，讲授元史及中西交通史，全家搬至沙坪坝校舍。由于生活艰难，先生只得尽力兼职，曾短期为边务训练班讲授西北民族史，短期兼任独立出版社编纂，拟写过边疆丛书计划。1945年秋东方语言专科学校成立，先生兼课1年，讲授印度史及中国通史，生活始稍得改善。

1944年中央大学组建边政系，系内课程的设置，以边疆民族文史研究及民族社会调查并重，先生受聘兼任系内课程。1945年秋，吴有训先生接掌中央大学，聘先生兼任边政系主任，直至1949年暑假停办。

任教南京

抗战胜利后一年，1946年夏，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途中顺道携眷返里省亲。为集中精力专心研究少数民族史，乃辞去也迁来南京的东方语专的兼职。当先生还在重庆边译会工作时，陈寅恪先生到成都，读到先生在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上发表的10余篇关于元史及少数民族史的文章，写信给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对先生很是称许，

于是用人唯贤的傅先生就约请先生去史语所工作。但因从重庆巴县乡下搬家至靠近宜宾的史语所所在地南溪县李庄板栗坳村，必须逆长江而上，再步行才能到达，实非易事，故先生只好向傅婉辞而就中央大学之聘。1945年抗战胜利后，傅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再次约请先生赴北大任教，因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坚留不放而作罢。1946年到达南京后，终于接受了傅斯年的又一次聘请，任中研院史语所兼任研究员，虽不支薪，却有研究上之各种方便。当时史语所不支薪的兼任研究员还有陈寅恪、汤用彤等著名学者，这是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又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在中大历史系开设的课程主要是元史、东西交通史、西北民族史、中俄交通史等，在边政系讲授的是突厥族史、蒙古族史、西藏族史3门课程。

1947年起，物价腾贵，生活又趋艰难，先生不得不兼任边疆文化教育馆编纂《译蒙文文法》（未完），秋，再次兼任东方语言专科学校教授，仍然讲授印度史和中国通史，从而辞去边教馆兼职。

1948年末，淮海战役结束，南京政府败势已定，中央大学筹谋迁校，同人等多纷纷离宁避战火，先生有一学生名余元庵（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接先生一家去上海其家暂住，但终不是长远之计，这时中研院史语所迁台湾，所长傅斯年还同时担任台湾大学校长，约请先生专任史语所研究员，并到台大任教，先生既无处可去，也无钱避居他地，平日治学全恃史语所书籍，今一旦迁去，研究工作即受影响，遂应允。于1949年1月中旬与史语所同仁乘“海黔”轮抵台湾基隆，转赴台北，与甲骨文专家董作宾一家同住台湾大学医学院一教室中。台北物价飞涨，语言不通，居住条件恶劣，更无法进行研究工作，先生一向深恶痛绝当局的腐败，每晚在史语所研究员全汉升先生家收听新华电台的广播，思想逐渐发生变化，毅然决定跟共产党走，遂托董作宾辞退聘书，率全家于2月中旬返回南京，参加中大应变会。

工作，筹备开学，并向学生作台湾现状报告，认为不去台湾为好，当时还有一些中大教授从台湾返回，如中文系的罗根泽先生等。

新的道路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先生任历史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1952年8月院系调整，仍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至1982年改任历史系名誉主任直至逝世。

解放以后，先生感到万象更新，学术生涯进入了新的阶段，正如《穹庐集》自序所说：“要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元代历史”^①；使元史研究能为祖国的文化建设服务”。在行政职务和教务极其繁忙的情况下，他挤出时间坚持进行研究。

1951年6月先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西藏的回顾》一文，这是先生在解放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此文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及西藏和平解放而作，标志着先生的学术研究发生了重大转变。1959年西藏反动势力发动叛乱，先生又在《历史研究》第7期上发表《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一文，充分利用汉、藏文史料，详细阐明从13世纪40年代起，西藏地方正式归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中央政府统辖的一个行政区，有力地驳斥了别有用心者对西藏历史的歪曲。1962年先生发表《论成吉思汗》一文，纪念成吉思汗诞生800周年，先生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蒙古社会的发展来评价成吉思汗的统一事业对蒙古民族形成和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不主张对成吉思汗全盘否定或崇拜赞颂。

多年来先生除主持历史系的教学、研究工作外，还先后开设了许多课程，如中国通史、元史、中国历史文选、西藏史、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西北民族史等。1951年7月先生赴北京参加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改革座谈会，在教学中他带头进行教学改革，在

1953年就试行学年论文 制定教学进度表 实行课堂讨论 教学实习，采用新的考试考查方法。1954年7月去北京参加高教部和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全国综合性大学历史专业教学计划座谈会，1955年夏开始招收元史专业研究生，1956年正式建立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并兼任室主任，开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注重培养他们关注、重视国内外最新成果的搜集和掌握，紧紧跟上蒙元史这门世界性学科发展的步伐，使自己立身于前沿之地。文革后分别于1978年、1981年首批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先生不遗余力地培养造就新生力量，勉励中青年学者超过自己，每见他们有新的成就他都无比高兴，热情赞扬，在南京大学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研究蒙元史的精干队伍。

学 术 活 动

先生以极大的精力参加了许多国内国际的重要学术活动，为学术进步及国际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6年11月，先生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成员赴蒙古国乌兰巴托参加蒙中苏三国历史学家合编蒙古史会议，并就三国编写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等有关事宜达成协议。次年12月，再次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成员赴莫斯科参加蒙中苏三国学者的三卷本蒙古史总编辑会议，讨论了三卷本蒙古史的提纲及分工，并进行了学术交流。先生在会上作《关于匈奴历史发展的特征与性质》的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注意，认为报告中提出的论点很有创见，值得重视。会后访问了列宁格勒，特别访问了苏联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并进行了座谈。1980年12月，先生以78岁高龄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国际编委会会议，当选为副主席，与会者除中国外，还有苏联、蒙古、土耳其、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美国、英国、日本、伊朗和阿

富汗等国，在会上先生据理辩论，挫败了某些人蓄意抹杀和贬低我国在中亚史上重要地位的企图，确保了在六卷本《中亚文明史》的编撰中，我国学者担任一卷主编，一卷副主编的地位。

1961年4月先生赴京参加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在会上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并负责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元代部分30余万字，此书作为高校文科教材，于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7月至9月，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乌兰夫之邀，参加国家民族委员会组织的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内蒙参观团，与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历史学家共16人一起赴内蒙古参观访问。西起包头，北至满州里海拉尔，行程15000余里，考察了各历史时期的长城遗址，金代界壕，阴山南北之汉代城堡，辽金遗址，鲜卑墓葬以及各地之历代古建筑、碑刻，领略了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自然风貌，并应邀在呼和浩特内蒙师范学院及包头作“蒙古古代史”报告，向大同市干部会议千余人作“汉族与北方民族关系中的大同地区”的学术报告，在南屯鄂温克族自治旗向军区及林业干部作“关于北方民族及呼伦贝尔史”的报告。访问结束后，在《民族团结》上发表“内蒙新感”一文。10月1日应统战部长李维汉之邀，参加国庆12周年观礼。

1962年应邀在北京中央高级党校、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讲授元史，为郑州大学作学术报告。1963年11月应邀赴吉林大学讲学，1979年4月应邀赴四川大学历史系演讲，接着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及陕西省史学会作“元史研究的发展及语音上所遇到的问题”的报告，1981年5月在厦门大学作学术演讲。

重任在肩

先生为人正直不阿，待人至诚，热爱祖国，深受学界敬重，平

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关心国家建设，期盼国家富强。于 1951 年参加九三学社，195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当选为江苏省第一届政协委员（1955 年）、江苏省第二届（1958 年）第三届（1963 年）第五届（1977 年）人大代表。1955 年 11 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1962 年南京历史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稍后，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成立，当选为第一届常务理事，1979 年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当选为副理事长，10 月，江苏省社科联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当选为副主席，1980 年 4 月，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同年中国元史研究会（10 月）和江苏省历史学会（12 月）成立，分别当选为会长。先生还受聘担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名誉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编委。

1963 年 11 月，先生出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会议，受到毛泽东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78 年 6 月，出席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1981 年 5 月，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委会副主任兼元史分册主编，亲自撰写重点条目，同年还担任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等学术领导职务。1965 年中央批准在内蒙古大学设立蒙古史研究所，经乌兰夫同志提议，中共中央批准，任命先生为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兼蒙古史研究所所长，先生以“第二甲子才二年”的昂扬奋进精神，偕夫人去呼和浩特赴任，为内蒙古大学的学术建设殚精竭虑，作出了重大贡献。文革骤起，回到南京。

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政治与学术任务，受到中央领导的极大重视。先生担任《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委会委员，1963 年先生去上海出席《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委会会议，负责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北方地区历代图幅的编绘。从此先生率元史研究室的青年教师锲而不舍、长期坚持这项工作，直

到 1966 年 6 月文革开始，才被迫停止。1969 年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工作重新恢复 先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历史地图的编绘中去，用不足半年的时间，完成了清代内蒙古驿站资料的搜集，并整理成文。1975 年先生重新主持这项工作，完成了北方地区的历代图幅。地图集于 1982 年正式出版。

一 生 心 血

由于《元史》以及后来历代海内外学者有关蒙元史的著作多有疏谬，先生在从事蒙元史研究中，早就感到需要编著一部元朝断代史。1958 年 先生结合教学 主持编写出了《元史纲要》（初稿 30 余万字。“文革”以后 先生经过深思熟虑 重新斟酌了全书的结构和章节，重编工作在先生主持下开始进行，由先生的弟子陈得芝、邱树森、丁国范、施一揆、姚大力、刘迎胜、王新民等分别执笔撰写各章 共约 70 余万字。1982 年以先生为主编的《元史论丛》第一辑出版 先生在其上发表《元史纲要 结语》一文，全面论述了先生对元朝历史的看法。这篇文章用生动的事实和比喻，深入浅出地回答了人们对元朝的许多疑问，可以说这是先生晚年的一篇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元朝历史的代表作。此书于 1986 年以《元朝史》为书名出版 这本断代史专著 是建国以来在我国元史学界与点校本《元史》并列的两项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 先后获得首届“中国图书奖”、“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先生自 30 年代以来，一直从事史学的教学与研究，在蒙元史、西北民族史和西藏史研究方面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并为培养史学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通晓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既继承了乾嘉以来考据之学的优良传统，又善于吸收近代欧洲东方